

一、中共「大興調研之風」觀察

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主稿

- 中共大興調研有其歷史背景，也有應對內外環境大變局尋求應變之道的需求，以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偏好。
- 中共高層領導人到地方調研並非輕車簡從，運動式動員調研出現「材料流轉」、「調研甩鍋」、「求量不求質」等異化現象，勞官又擾民、流於形式。

（一）前言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帶頭深入調查研究」，其後大興調研之風，成為中共黨政部門工作重點。2022年12月底，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要大興調研之風，要求領導幹部多到分管領域的基層一線去，多到困難多、群眾意見集中、工作打不開局面的地方去，體察實情，全面掌握情況。

今（2023）年2月底，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公報強調，要大興調研之風，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真抓實幹的作風。同年3月13日，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記者會上表示，對新屆政府加強自身建設第一項，就是要求大興調研，要推動各級幹部多到一線去，問需於民、問計於民。3月19日，新華社公布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下稱《工作方案》），稱中共中央決定，「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作為在全黨開展的主題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各地區部門針對12個方面，包括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依法治國中的重大問題，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推進共同富裕、增進民生福祉中的重大問題，人民急難愁盼的具體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中的重大問題，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長期未解決的老大難問題等展開調研，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隨後，李強等領導人展開調研，其他副國級、省部級黨政領導，亦立即密集展開地方調研。本文擬探討本次中共大興調研的背景，說明近期中共部委以上領導人調研情況，最後分析其意涵與影響。

（二）中共大興調研的背景

中共大興調研，有其歷史背景，也有面對近年內外環境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尋求應變之道的需求，以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個人偏好。

首先，從歷史來看。毛澤東是中共調研的先驅，長期倡導和身體力行大規模的調研活動。1925 年春，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湘潭，從事農民階層的調研，並參與農民活動。1927 年 3 月，毛澤東赴湘潭等 5 縣考察，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日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的誕生奠定基礎。其後，毛又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尋烏調查》等著名調查報告；並留下「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等名言。1941 年，毛澤東在延安，從中央機關到地方組織，先後成立各種類型的調查團，展開廣泛、深入的調研活動。同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立中央調查研究局，自此，調研成為中共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度。1956 年，中共「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親自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調研，並形成毛著名的《論十大關係》。1957 年底，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各地浮誇風盛行，虛報糧食產量，加上旱、澇天然災害，導致 3 年大饑荒，幾千萬人餓死。為此，毛澤東在 1961 年 1 至 3 月，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希望 1961 年「成為一個調查年」；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並深入各地農村，開展調研。其後，中央政策出現轉折，抑制毛的「大躍進」運動，糾正官僚與形式主義，以及人民公社化的過激行為，同時讓農業恢復增長，緩解大饑荒。

此後，依照中共調研制度，中共高幹，特別是副國級以上的中共領導人均會定期分赴各省、市、自治區視察，就個人主管業務到地方進行調研，以瞭解民情。重要的地區如沿海各省市，以及人口眾多省份如：四川、湖南等，每一個中共領導人大約每年會去視察一次，其他地區則約 1 年半或 2 年視察一次。

其次，在當前內外環境方面。《工作方案》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

更加嚴峻複雜，迫切需要通過調研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就現實來看，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基礎上。然而，大陸經濟面臨內外交迫，外在有與美國的貿易戰、高科技產業鍊脫鉤、地緣政治圍堵等；在內部歷經3年疫情封控，國內經濟下滑嚴重，出口衰退和投資停滯、失業情況嚴峻、中央及地方財政收入下降，同時面臨外企外移、外資外逃嚴重，民營企業經營困難與企業家信心低迷。尤其是動態清零防疫政策對經濟社會造成影響，嚴苛的防疫措施引發民怨，抗疫成效與付出的經濟社會成本不成比例，社會矛盾明顯激化，衝擊民眾對黨國的信任感，造成黨國公共信任危機。與此同時，中共嚴厲的反腐作為，形成寒蟬效應，造成幹部懶政、怠政，加劇積重難返的「等、靠、要」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上述問題未能解決，勢必影響到中國大陸社會穩定與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第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重視。習近平效法毛澤東的舉措不勝枚舉，其中重要之一就是調研。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即曾於2003年要求該省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習近平於2012年接任中央總書記後，在會議講話等活動中，多次提到要深入開展調研，例如：習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及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強調，要在全黨大興調研之風。習近平並身體力行，經常赴各地考察調研。

（三）近期中共部委以上領導人調研情況

《工作方案》公布後，中共各部委、各省紛紛跟進表態，印發關於大興調研的實施方案。如公安部印發《關於在全國公安機關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河北省委辦公廳印發《河北省貫徹落實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工作方案的主要措施》。從上到下各層領導，紛紛就分管業務進行調研。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方面。4月10至13日，習近平到廣東湛江、茂名、廣州等地，深入企業、港口、農村等進行調研；5月10至12日，在河北省雄安新區、石家莊等地，考察新區建設、生態保護、企

業研發生產和當地推動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等情況。國務院總理李強則於3月21至22日赴湖南針對先進製造業和實體經濟展開調研首秀；3月29日至海南省調研；4月12日，在北京調研獨角獸企業發展情況；4月24日至26日，至廣西、雲南調研；5月17、18日，赴山東調研企業工廠。3月21至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到廣東珠海、廣州等地調研，就編製立法規劃、立法工作聽取意見。3月底，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走訪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3月19至21日，中央紀委書記李希到湖北調研紀委監委機關、基層社區、國企、高校的黨風廉政建設。

在中央政治局委員方面。3月26至28日，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在內蒙古調研檢查安全生產工作；5月14至16日，在雲南調研防災減災工作。4月16日，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赴該市靜海區調研；5月5日，至天津市宣傳文化系統調研；5月8日，赴濱海新區中新天津生態城調研。4月17至19日，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峰在貴州調研，瞭解脫貧群眾生產生活情況、查看幫扶專案等；5月11至13日赴浙江調研落實統戰工作責任制。4月18至19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鴻忠在浙江、上海調研。4月17至19日，中央政法委書記陳文清在海南三亞、儋州、海口，調研政法機關開展主題教育、保障自貿港安全等工作情況。4月20日，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至該市靜安區調研城市更新工作。5月中，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到江蘇調研農業科技研發和成果推廣應用等情況。5月9日，北京市委書記尹力調研市屬金融機構，並指導開展主題教育；5月16日，調研殘疾人事業發展、水電氣熱運行情況。

在國務委員方面。3月20至22日，國務委員譚貽琴到江蘇省常州、南京，了解就業市場供求、企業用工、重點群體就業等情況；4月24至27日，在陝西省、甘肅省調研民政和殘疾人工作等情況。5月2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秦剛至雲南中緬邊境調研，查看姐告國門、畹町口岸芒滿通道、邊境社區，聽取基層建議。

在中央黨政部委領導方面。3月19至21日，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赴天津市濱海新區、河北省秦皇島，調研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3月底，生態環境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孫金龍至江蘇省調研；5月8

至 10 日，率隊赴山西省襄汾縣，調研基層生態環境部門隊伍建設和履職能力面臨的矛盾和問題。3 月 27 日，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帶隊赴中國工程院調研座談，聽取意見建議。4 月 17 至 19 日，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到廣東省揭陽、汕尾、珠海、廣州，調研交通運輸重大工程項目建設情況等。5 月 7 至 8 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在廣州調研考察指導工作。5 月 11 至 12 日，應急管理部部長王祥喜到國家自然災害防治研究院、國家減災中心調研，瞭解發展情況，聽取意見建議。

綜合來說，中共高層領導人到地方調研並非輕車簡從，仍有大批陪同人員；都是蜻蜓點水的表象調研，而非長期蹲點的深入調研；與其說是調研，不如說就是一般考察、參訪、座談。

（四）中共大興調研的意涵與影響分析

第一，習近平不斷地透過全黨思想學習教育進行幹部整頓。習掌權 10 年，接連舉行多次全黨思想學習教育，首先在 2013 年 5 月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整治黨員「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隨後陸續開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這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領導人前所未有的舉措。如今，再次掀起的「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其實這是現階段中共進行的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為重點，在全黨開展「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的一環。顯示在思想教育層面，中共黨員及官僚隊伍太龐大，透過由上而下的整頓教育，收效有限，潛藏的問題未能澈底解決，以致只能不斷地進行教育再教育、整頓再整頓。

第二，調研運動恐流於形式主義。毛澤東那一代人，曾經親力親為深入基層進行調研，親自寫出紮紮實實、讓人傳頌的調研報告。然而，時代演進，當代中共黨政領導，政事繁雜，不可能像毛早年那樣，真正做到 1、2 個月長期蹲點調查，只能進行 1 至 3 天蜻蜓點水式現場考察調研。然而，這種作秀式調研，雖然比不親臨現場好，但其實也是一種形式主義，看到盡是表象，而不是深層問題。

第三，專家調研勝過勞師動眾的動員式調研。依照《工作方案》，

要求「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成員每人牽頭 1 個課題開展調研」；未來一年，大興調研勢必成為中共各級黨政幹部最重要的工作內容。根據非正式統計，中共縣處級以上幹部恐有百萬人之多，由於方案指明是領導班子，因此折半計算，也將產生 50 萬篇調研報告。如何從如此龐大的量，篩選成高品質的決策參考資料，恐怕不容易，也不多。4 月 13 日，新華社所屬《半月談》發表評論文章自曝亂象：調研出現「材料流轉」、「調研甩鍋」、「求量不求質」等「異化苗頭」。既然如此，又何必勞師動眾大興調研。事實上，只要中共最高領導人願意聽真話，要求講真話、指缺失，要求中央部委到縣處機關、業務單位，分別派出由專家參與的調研組，針對 12 個面向，進行對策性、前瞻性調研，自然「真正把情況摸清、把問題找準、把對策提實」，而不是運動式動員，勞官又擾民。

第四，遭質疑中共以調研為名進行「大清洗」。習近平好以毛為師，善於從毛的歷史經驗尋找靈感，印證習近平是典型的毛澤東信徒，同樣面臨著因為國家發展路線與政策錯誤而導致嚴重困難之際，企圖透過在全黨大興調研之風，走出困境。然而，1941 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調研，最後演變成延安整風；1961 年，毛澤東發起全黨大興調研之風，查明地方困境後，雖一時抑制「大躍進」運動的激進作為，但也讓毛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懷恨在心，促成文化大革命的遠因。因此，一些比較負面的看法，認為中共以大興調研、走向群眾為名，實則在「引蛇出洞、整黨整風」。然而，當下中共政治環境與毛時代大不同，目前也沒有派系鬥爭問題，似乎不宜解釋為一場「大清洗」即將來臨。然而，這樣的歷史印象，對中共幹部總是一道揮不去的陰影。

二、中國大陸穩就業措施及相關工作觀察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鄭志鵬主稿

- 中國大陸 4 月份青年失業率高達 20.4%，明顯高於 OECD 國家平均 12.8% 水準，預估下半年畢業季後青年失業率將再向上攀升。
- 中共推動「國進民退」、整頓科技巨頭、教育「雙減」等衍生大量失業問題未解，提出金融融資、財政補貼、技術培訓、國企擴大招募、基層就業等穩就業措施成效難料。
- 失業問題造成大量青年繼續升學「考研」，或抱持「躺平」等消極思維。另中國大陸就業高度競爭狀況，或影響臺灣學生赴中求學意願。

（一）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持續嚴峻

中共國家統計局 5 月 16 日公布調查數據顯示，2023 年 4 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不到 6%，但 16 至 24 歲城鎮調查青年失業率卻高達 20.4%，創下 2018 年 1 月份以來的最高紀錄，等於有 2 成的年輕人口處於失業狀態，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每 5 個年輕人之中就有 1 人找不到工作。2022 年 12 月份這個數字為 16.7%。與國際相較，2022 年 OECD 國家青年平均失業率大約是 12.8%，中國大陸數字仍偏高。

中國大陸青年高失業率的問題，又因這幾年高校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而加劇。去年（2022）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人數首度突破千萬人，來到 1,076 萬人，比 2021 年增長 167 萬人。根據《新京報》報導，依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資料顯示，2023 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預估將達 1,158 萬人，較去年增加 82 萬人。畢業人數增加，當然會加重青年就業的競爭壓力，而且這份資料還顯示，北京市今年的碩博畢業生人數，預估將首度超越高校畢業生。

根據天下雜誌 2023 年 5 月 17 日編譯外電的報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卓賢撰寫的一份報告，畢業生的失業率是整體青年的 1.4 倍。由此可知，2023 年下半年的青年失業率可能會隨著畢業季到來，再次向上攀升。

(二) 中共穩就業措施

為了應付居高不下的青年失業率，中共國務院在 2023 年 4 月 26 日發布《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重點包括：加大企業的吸納就業能力、支持金融機構的融資服務、發揮創業帶動就業、加強技能培訓力道、支持國有企業擴大招聘規模、鼓勵引導畢業生至基層就業，以及實施 2023 年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劃等 10 多項措施。

上述措施其實都不是新的政策，因為中國大陸高校擴張自 1990 年代便已開始，高校畢業生增加是歷史長期的趨勢，官方早應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要解決問題必須投入資源。中共財政部調研小組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布《2022 年中國財政政策執行情況報告》，中央提供就業補助資金 617 億元與 1,000 億元的失業保險基金穩定支持就業，並延續實施失業保險穩崗返還政策，將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返還比例分別從 30%與 60%提高至 50%與 90%，幾乎是由國家補貼企業重新聘人，也出臺許多針對高校畢業生的一次性擴崗補貼政策與一次性吸納就業補助政策。自 2022 年畢業季以來，總共向 52 萬戶企業發放 27 億元。

為了回應國務院《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通知中，「鼓勵引導畢業生至基層就業」這項政策其中一個方案，穩定「三支一扶」計畫（大學生在畢業後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工作），廣東省政府進一步提出一項解決青年高失業率辦法：將 30 萬失業青年送到農村工作 2 到 3 年。有媒體報導（Newtalk 新聞）說這是一項頗具爭議性的政策，因為「三支一扶」計畫不只是一要解決青年失業問題，也要控制因疫情封控帶給城市人的不滿情緒，中共可以藉此將這些城市內憤怒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分散到農村地區。

據官方數據，2022 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累積共 1,206 萬人，並宣稱超額完成 1,100 萬人的全年預期目標。即便我們「相信」官方的統計數據，這個數目也只足夠應付每年的高校畢業生，還有不少的中國青年仍處在失業、待業、求職、轉職、非典型工作的就業市場環境中。

中國青年高失業率以及中國政府出臺治理高失業率的政策成效取決於國內外因素的變化。

(三) 影響穩就業政策成效的不確定因素

解決失業問題的重要條件是有足夠的工作機會，工作機會又與經濟發展高度關聯。當今中國經濟走向與前景深受以下幾個因素影響：

1. 「國進民退」

在胡溫主政時期，對於中國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存在兩種不同觀點：「民進國退」與「國進民退」。「民進國退」指的是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進行的市場經濟轉型，使得私營經濟不論在年成長率、就業機會的提供，以及對國內經濟產值的貢獻，都遠超過國營部門的表現，而這是產權轉變的必然結果。但「國進民退」觀點提醒我們注意國營企業的重要性，並沒有隨著改革開放時間的推進而下降，相反地，在中共的協助下於 2003 年之後開始獲利，並且控制著許多被稱為「戰略高地」的策略性產業，因此這個觀點又被稱為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在習近平時代，國家資本主義已經進展成為「黨國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對資本的控制下，不含有公有、集體身分的私營企業的發展逐漸被邊緣化，這對長期以來供給大多數人民就業機會的私營部門（超過 8 成）是非常不利的趨勢。

2. 產業升級與政策調整

這幾年，中共對科技、教育和房地產業頒布許多政策，讓這些行業各自面臨不同的挑戰，也影響年輕人就業機會。例如中國製造 2025 的計畫，羅列十項關鍵產業，包括半導體、AI 製造與機器人、航空航天、高技術船舶、軌道設備、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業設備、新材料、生醫等產業。特別是半導體，是中國製造 2025 重中之重，地方政府更是競相投入蓋晶圓廠，但發展卻不見成效，這將對青年就業機會提供帶來衝擊。房地產業亦然，過去這些年，房地產一直是地方政府重要財政來源，但政府的打房政策與融資緊縮不僅重傷房地產市場，讓許多房地產商，像是恆大，面臨債務及倒閉危機，也減少工作機會的提供。最後，2021 年的「雙減」政策更是重挫教育業的發展，

頓時讓許多人失去工作，光是新東方這一間補教業龍頭，就辭退 6 萬名員工。以上的行業發展與變化都會影響青年人的就業機會與選擇。

3. 新冷戰國際格局的形成

自美中貿易戰以來，全球供應鏈進行重整，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正在發生轉變，這與中共想要在全球價值鏈彎道超車，擺脫西方先進企業控制有關。但中共這幾年藉由威權銳實力積極對外擴張，影響西方國家內部政治運作，更進一步促成國際新冷戰格局的形成。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外資紛紛撤出中國大陸，臺商也不例外。重點是，這些外資以往提供民眾許多就業機會，與世界經濟脫鉤，也代表這些就業機會的流失，將導致青年失業率提升。中共的穩就業措施是否能夠彌補外資撤資所失去的工作機會質量，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四）青年高失業率的後果

青年「畢業即失業」可能帶來 2 個立即可見的後果：第一，「考研」的人數變多，繼續攻讀碩博士不僅可以延後進入就業市場，也能夠替自己累積更多日後找工作的教育資本。第二，有更多的中國大陸青年對於高失業率感到挫折與不滿，因為努力讀書、有個好學歷並不能保證帶來好的職涯發展；因此，選擇「躺平」來表達對就業環境的不滿。青年「考研」與「躺平」，都是間接否定中共穩就業政策的實施成效。

中國大陸青年的高失業率，也會對赴中求學與就業的臺灣年輕人帶來衝擊。2010 年中共已開放臺灣學生可以用學測成績申請中國大陸高校，到 2014 年這個數目已超 1 萬人，大幅超越長期以來為臺灣學生留學首選的日本、澳洲、英國等地，而僅次於美國。直到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發生，才打斷這個成長的趨勢。如今中國大陸解除封控，這個趨勢會不會於今年再起，值得後續觀察。不過當初許多臺灣學生赴中求學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看在中國大陸未來就業市場的潛力，但現在則必須將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人滿為患，帶來的高度競爭狀態列入考慮，審慎做出選擇。

三、近期中國大陸民眾政治信任及輿論觀察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信賢主稿

- 近期中國大陸社會出現質疑城管、農管執法、公權力擴張、退休金銳減等輿論，對政府信任度下降。由於黨中央高度集權決策，使民眾對施政不滿的矛頭直接指向黨中央的情況日益增加。
- 社會心理的焦躁浮動、衝突不斷，「愛國主義」甚至不敵民眾的生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政府對不利言論極其敏感而「無限上綱」，也為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

根據過去國際機構的調查顯示，相較於其他國家，中國大陸民眾的社會安全感較高，且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位居全球前列。然而，近來經濟下行趨勢未緩、失業率急遽攀升、疫情防控亂象，以及從「動態清零」到「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政策大轉彎，使得民眾的社會安全感急遽下降，與此同時，對政府的信任感也不似以往。去年 11 月底在 50 多個城市所發生的「白紙運動」便是此種社會集體心理的呈現。根據此，本文對近期大陸輿論與政治信任有以下觀察與分析。

（一）從「賣崽青蛙」談起

近期「賣崽青蛙」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遍地開花，一些穿著逗趣綠色青蛙裝，在街頭販售青蛙造型氣球，逗趣模樣幾乎成為城市街頭笑聲的來源。然而，也正因其流動攤販的性質，終究難逃「城管」的驅趕。杭州一隻「青蛙」被城管抓住，被罰面壁思過；寧波交警攔下騎電動自行車沒戴安全帽的「青蛙」，罰款 20 元。而近期引發輿論反彈的是，一隻「賣崽青蛙」在上海街頭「落網」，當場被城管要求褪去蛙皮。支持青蛙的網民主要有兩大理由，一是「不是生活所迫，誰會忍心賣兒賣女」，由於多數青蛙裝下是失業的、下班後兼差的青年，也有無業的老年人，其折射出當前經濟下行、青年失業與社會不公平；第二是「中央不是鼓勵地攤經濟與內需？」，在新一任政府上臺後，地攤經濟政策重新被點燃，甚至在「五一長假」火爆出圈的「淄博燒

烤」也成為官方媒體報導的焦點，淄博一躍成為網紅城市，而「賣崽青蛙」卻成為各大小城市街頭中被驅趕的對象。而此折射的便是對政府執法差別待遇的不滿。

（二）各類社會保險的短缺

去年年底起，廣州、武漢、大連等地陸續出現退休人士抗議醫療保險改革的「白髮運動」，各地不少退休人士的醫保金減少五至七成不等，使民眾對醫保制度改革的反彈浮上檯面。深究其中，與近年來每況愈下的地方財政有關，由於經濟下行、房地產與爛尾樓問題，近年地方財政因鉅額防疫支出惡化，防疫支出挪用了部分醫保基金，為本次醫保改革削減個人帳戶每月金額的主因。與此類似，大陸自 2022 年起實施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全國統籌，各省市社保系統近期陸續切換至新系統，然而上海、深圳的民眾最近卻在登錄新系統後，發現自身社保帳戶退休金的試算金額大幅減少而引發爭議。網路上紛紛出現「如何看待上海與深圳人的社保帳戶餘額一天少了三分之一？」、「我國養老金的缺口究竟有多大？」的疑問。同樣地，其根本原因也是經濟下行、疫情封控與地方財政惡化的問題，值得探究的還有兩個議題，一是連財政狀況名列前茅的上海與深圳都有此問題，那其他地方呢？二是養老保險金的「全國統籌」，是否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年代？這也無怪乎不少上海市民會說「上海的房價怎麼不納入全國的大池子一起統籌呢？」。

（三）農管強制執法引發的爭議

繼「城管」的「城市管理執法」後，近期中國大陸多地農村出現被民眾稱為「農管」的執法隊伍，佩戴「農業綜合行政」臂章強力要求農民「退林還田」、禁止房前屋後種瓜種菜、務農需要持證上崗等，進而引發議論。此波「農管」的爭議，追根溯源還是來自於中共所擔憂的「糧食安全」，包括農管強制農民砍除種植的樹木而須改種農作物，保證 18 億畝耕地主要是要種糧食，亦即該種什麼、怎麼種，一定要統一管理。近年來，習近平不斷強調「糧食安全」，在「二十大」

報告也強調的國家安全，也就是習所一再主張的「自力更生」以及「飯碗要端在中國人自己手裡」。而縱使官方一再提出「農業綜合行政」是為了統一執法而設，其範圍有限而非大小事全管，且其執法有據。但由於「城管」的惡名昭彰，常仗著執法之便，惡性欺壓百姓，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時有所聞，近期不少「農管」在農村惡行執法，透過網路傳播而引發民眾不滿，也讓人不得不將農管與城管進行聯想。而一旦出現此種連結，也代表官方在農村要正常執法的難度增加。

(四) 後疫情時期青年與城市中產的政治信任大降

近年來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公權力的擴張、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年輕人在疫情時代看待自己未來的想法正在產生變化，早在去年 5 月《知乎》一篇名為「今年新冠疫情，讓你的觀念發生了哪些變化」的文章中，「比起疫情，無限擴張的公權力才讓人害怕」的回應點讚數、回應數與轉發數極為驚人，即可看出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成效及公信力都提出了質疑，且主要為青年與城市中產。首先，疫情期間過度封控使得青年失業率大增，2021 年底以來從未低於 15%，2022 年青年失業率高達 19.9%，甫公布的 2023 年 4 月數據甚至攀高至 20.4%，其中，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更遠高於一般青年。也因此，近期不論是網上串連，或是實體的行動，如去年 11 月底的「白紙運動」，青年都是對時政不滿的主要人群。其次，中產階層在工作與家庭穩定後最需要的是「穩定」，但疫情期間官方強制的防疫措施，後又出現政策大轉彎，都在彰顯出政府權力的無限制擴張，這也讓中產階層產生焦慮。因此，這 2 年社會出現從「內捲」、「躺平」、「潤學」到「人礦」的輿論，也是以這些群體為主。

(五) 差序政府信任結構大受衝擊

過往在中國大陸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研究中，多有「差序信任」的研究結論，亦即從中央、省，一直到省以下的各級政府，信任程度逐步降低。由於對上級政府信任較高，也為中共中央豎起一道道施政的防火牆，一方面，每一層級地方政府都可能將民眾的不滿阻絕於地方，

另一方面一旦中央出手解決問題，亦能迎來「包青天」美名。也因此，過去抗爭民眾常舉的標語為「請中央救救我們」、「請共產黨救救我們」。然而，近來此種政府信任結構出現轉變，除經濟下行看不到盡頭外，主要還是疫情期間，各地採取嚴格的封控與核酸檢驗，造成民眾的不滿，甚至是衍生出多起「次生傷害」；而民眾多清楚，嚴格防疫政策的源頭是中央而非地方政府，這也是為何在白紙運動期間，群眾出現「直指中央」，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抗爭口號之故。而過去十年來，地方權力不斷向中央集中，也代表前述「防火牆」的功能減弱，若此種趨勢不變，日後民眾因對施政不滿而直指中央的情事也將增加。

（六）政治信任下降後的社會治理

承前所述，正因在經濟下行與疫情封控帶來對政府信任的下降，對中共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至少有以下幾個影響，首先是整體社會心理出現的焦躁與浮動，在無處宣洩下對轉而將矛頭對準他人，具體呈現在日常紛爭的增加，在街頭、公共運輸、商場中，民眾間摩擦與衝突較以往更為頻繁。其次，近期在網路上出現一波「不願為國而戰」的論戰，並擴散至中國大陸各個網路平臺，包括網易、知乎、今日頭條等網站等，主張不願上戰場的主要理由為「對社會不平等的不滿」以及「不願為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戰」，是否代表官方所帶動的「愛國主義」逐漸不敵一般民眾的生計考量與對現狀的不滿，值得進一步觀察。再者，政府對於稍有不利的言論也極其敏感進而「無限上綱」，如笑果文化公司的脫口秀演員李昊石（House），因以「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形容寵物狗的段子，被民眾舉報「辱軍」、「侮辱『人民子弟兵』」，脫口秀演員雖有踩紅線之虞，但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與文旅局隨即對該公司與演員作出嚴重的行政處罰，官媒也大加撻伐也引發議論。最後，當前中國大陸出現的社會事件雖不致對中共統治造成立即而明顯的挑戰，但如同前述，將會對民眾的政治信任造成衝擊，也會對未來的社會治理埋下不可預期的伏筆。

四、G7 及民主峰會涉中議題觀察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宏仁主稿

- 北約秘書長和多位國家領導人於哥本哈根民主峰會強調，對中國帶來的新挑戰必須嚴肅面對；對南海、臺海問題，在戰略上應該改變過去的模糊策略。
- G7 會議中英國首相蘇納克直言中國是我們時代中最大的威脅，美國及 G7 國家就中國的經濟脅迫問題提出共同關切；領袖發表「廣島宣言」，對中國採取一致的立場，即「去風險」而非「脫鉤」。
- G7 領袖對於臺海穩定的重要性提出關切，美總統拜登表達反對中國片面對臺灣有任何的行動，並清楚表示如果中國試圖片面改變現狀，美國一定會回應。

（一）前言

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以及 G7 廣島會議中，歐洲國家以及主要世界工業大國均表達，對於俄羅斯和中國對未來國際秩序挑戰和威脅的憂慮，對於中國對臺灣可能的片面軍事行動，以及臺海將來可能爆發的衝突，對許多國家來說已經不是單純的獨立事件，而是和所有國家都有切身的安全關係和連動性。檢視民主峰會和廣島會議上諸多共同聲明的用辭立場，中國無疑是當代國際秩序與規則下一個最嚴重的威脅，各國領導人已經努力試圖做好防範與嚇阻的準備。

（二）哥本哈根民主峰會

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會中，各場次演講者多針對所屬領域進行發表，其中與臺海問題、中國問題有關的論述，以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之談話、捷克總統帕維爾（Petr Pavel）之論述、英國前首相特拉斯（Liz Truss）的談話為主要涉及之面向。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與民主國家聯盟基金會創始人兼主席拉斯穆森均在民主峰會上表示，在新的戰略概念中，北約正嚴肅面對來

自中國的挑戰。針對北約與中國的關係已經不再侷限在大西洋地區，進一步涉及臺灣及南海問題。北約秘書長認為，「北約於南海也有盟國的存在，將繼續維持北美和歐洲的區域聯盟運作模式。中國的作為對我們的安全很重要，中國對我們的利益、價值觀和安全構成了挑戰。這也是我們現在與亞太地區的夥伴更密切合作的原因，同時我們必須明確地傳達臺灣及其周邊地區的現狀不應該透過武力改變現狀，中國對臺灣的威脅性言論和行為是沒有道理的，臺灣周圍的任何分歧和爭端都應該透過和平手段來解決」。可見臺灣問題對於北約，已經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並在這樣的情況下，北約成員國與臺灣的經貿與安全合作往來密切，成為北約必須重視的安全問題。現今存在北約安全戰略中，已明顯將中國納入戰略問題的一環，與此次 G7 會員國所表達的立場與態度相近，西方國家對中立場正如上述北約秘書長所提及的，已經越來越清晰與明朗。

捷克總統帕維爾也是在本次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中，針對中國和臺灣問題提出強烈立場的領袖之一。帕維爾表示「過去大家與中國互動只看到經濟面向，但中國的戰略利益和社會核心價值與西方有根本的差異，無意與他國建立對等夥伴關係，而是企圖支配世界；因此，長期來看中國的危險程度遠超過俄羅斯」。帕維爾是以戰略核心價值作為談論重點，呼籲不可再以單純的經濟問題看待中國。針對臺灣問題，更指出：「多數國家尊重『一中政策』，捷克也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將中國和臺灣定位為『一中兩制』，認為臺灣的制度應該保留下來，這點與中國的『一中一制』不同」。帕維爾在所謂的「一中兩制」這樣的認知上，試圖將臺灣與中國做出切割，藉由分享共同民主價值促進臺灣與捷克的雙方合作。

捷克總統帕維爾與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以及 G7 成員國所傳達的理念相似，皆重視臺灣及南海問題。此外，帕維爾更提出面對中國急劇升溫的挑戰，民主國家的團結不可或缺，應當透過彈性與務實的做法與非洲和南美洲合作。此類型的國際間合作方式，也呼應著蔡英文政府現今所採取的外交政策。

(三) G7 峰會

G7 成員國對於中國已經凝聚一定的共識，在經貿交往上採取「去風險」(de-risk)，而非脫鉤 (de-couple) 的做法。G7 成員之間的經濟合作試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美國對於中國政策將以經濟議題為核心，強化 G7 之間的合作，如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Jake Sullivan) 所言，要建立更有彈性的供應鏈、出口管制及對外投資措施來實踐經濟合作。G7 成員透過此次廣島峰會，不但有多邊的共同聲明，也有雙邊的協議，均包含對於中國威脅的嚴正關切。例如：

1. 廣島協議中，日英共同聲明呼籲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並強烈反對世界上企圖單方面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任何地方。
2. 美日領導人峰會，在區域問題共同指出，不容忍任何單方面試圖透過武力改變印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現狀。此外，日美領導人同意繼續密切合作，解決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並一致認為與中國交往是需共同應對的挑戰。
3. G7 聯合公報針對中國問題，從經濟議題聚焦，涉及多項中國內政問題，並強調並非打擊中國，而是為了全球秩序共同努力。另針對俄烏問題，發表一致的共識，確認目前的政策共識不是為了傷害中國或阻撓發展，但各國認識到民主國家需要有經濟韌性，共同透過去風險和供應鏈的多樣化，降低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另外，在涉及臺海的部分：

1. 日英對於臺海問題的目標一致，共同針對臺海問題聲明，強調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重申臺海和平穩定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因素，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2. 日美領導人峰會上，重申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海峽兩岸問題。
3. G7 共同公報重申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認為這是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所不可缺少的。七國集團成員在臺灣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包括一個中國政策，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四) 結語

哥本哈根民主峰會的內容，比較著重在理念的傳達、捍衛價值的呼籲，以及對於中國威脅的示警。G7 廣島峰會則是更有具體合作項目的討論，包含雙邊、多邊的合作項目。G7 峰會顯然較有具體的成效，特別是日本在國際地位的提升，藉由此次會議，與英、美等國更加強全球戰略夥伴關係，深化在經濟供應鏈、網路安全的合作。對各國而言，中國是區域安全維護中最不穩定的因素，這其中涉及到軍事、外交、經貿、網路安全等領域，G7 廣島峰會上也針對各國如何合作，打擊可能犯罪行為，做出制度性的合作承諾，所欲營造的是更為安全的區域環境和架構，用以限制中國在未來任何可能改變現狀的行動。

五、首屆中國 - 中亞五國元首峰會觀察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東杰主稿

- 近年中亞國家已分別與美歐日中俄印等國，各自建立層級不同之 C5 + 1 機制，中亞地區成為競相拉攏焦點，中國如何利用其地緣鄰近優勢，發揮影響力並據此掌握戰略籌碼，值續關注。
- 烏克蘭戰爭持續進行的情況下，中國在中亞地區作為與中俄關係下一階段之連動特徵，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一）從外長會議到元首高峰會

自 2020 年首度以視訊方式舉辦「中國—中亞外長會晤」後，便商定未來每年將由中國與其他國家輪流舉辦；據此，繼 2021 年於西安、2022 年於哈薩克努爾蘇丹舉辦，第 4 次會晤再次於 2023 年 4 月在中國西安登場；六國外長重申尊重彼此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相互支持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之問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中國外長秦剛並表示「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在中亞製造混亂和動盪，中國政府堅定支持中亞國家主權、獨立、安全和領土完整」。除了強調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框架下處理區域安全穩定議題，並預計深化全方面交流合作，中方也聲稱此次會晤將為 5 月舉辦的首屆高峰會作好全面政治準備，以便讓「中國—中亞」成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首屆「中國—中亞峰會」於 2023 年 5 月 18 至 19 日在西安正式登場，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出席，哈薩克總統托卡葉夫、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塔吉克總統拉赫蒙、土庫曼總統別迪穆罕默多夫、烏茲別克總統米爾則亞耶夫都應邀與會，且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與烏茲別克四國元首於 5 月 16 至 20 日分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中國外交部指稱，「這是今年首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也是建交 31 年來，六國元首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辦峰會，在中國和中亞國家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根據會後公布文件，此次峰會共通過 54 項合作共識與倡議（包括峰會機制化、成立常設秘書處、推動各領域部長級會晤、研擬並落實跨國運輸聯通等），中方倡議成立 19 個多邊合作平臺，各方並

通過 9 項多邊合作文件，包括《峰會西安宣言》、《產業與投資合作諒解備忘錄》、《加強經貿合作諒解備忘錄》、《數字貿易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基礎設施和工程建設合作發展諒解備忘錄》、《農業部長會議機制諒解備忘錄》、《海關署長會晤機制工作章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及《關於成立實業家委員會諒解備忘錄》等。

(二) 近年來各主要國家於中亞競合發展

以 1996 年由中國、俄羅斯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建立之「上海五國會晤機制」為基礎，在 2001 年烏茲別克加入後，各國首先成立了一個聚焦中亞區域安全議題之「上海合作組織」(SCO)，除年度峰會與總理理事會機制，2005 年起開始推動聯合軍事演習，自 2015 年起更啟動接收新成員，至今已有印度與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伊朗與白俄羅斯則在程序之中。於此同時，以習近平於 2013 年 9 月在哈薩克首次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為出發點，中國於翌年正式啟動「一帶一路」建設規劃，除塔吉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烏茲別克分別於 2014 至 15 年加入，土庫曼也在 2023 年與北京簽署合作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亞傳統領導勢力，俄羅斯除配合前述與中國之合作行動外，一方面自 2011 年起倡議之「歐亞經濟聯盟」(EEU) 於 2014 年成立，莫斯科於 2022 年也推動首屆「俄羅斯—中亞峰會」；其次，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 1997 年提出試圖納入中亞與外高加索八國之「絲綢之路外交」後，2004 年推動建立「日本＋中亞五國外長會晤」機制，至 2022 年共舉辦 9 次；至於歐盟在 2007 年公布首部中亞政策文件《新夥伴關係戰略》後，2019 年再度發布《更堅實夥伴關係之新機遇》，2022 年並推動首屆「歐盟—中亞峰會」；再者，美國則由國務卿希拉蕊在 2011 年倡議「新絲綢之路計畫」，2015 年起正式推動「中亞＋美國外長對話機制」，至 2022 年共召開 6 次；最後，印度在 2012 年提出所謂「連接中亞」戰略後，2019 年亦與中亞五國正式建立部長級會議機制。

由上可知，中亞國家已分別與中國、俄羅斯、日本、歐盟、美國和印度各自建立層級不同之 C5+1 機制，顯現此區域之「兵家必爭」。除中亞五國在 2017 年共建高峰會機制以凝聚自身博弈能量之外，無論如何，北京與此區域發展前景不啻引發外界最大關注。

(三) 中國與中亞峰會之政策意涵與影響

習近平在 2022 年 1 月便與中亞五國進行「建交 30 周年視頻峰會」，會後並發表聯合聲明決定打造「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接著，不僅五國元首隨即在 2 月齊聚北京參加冬季奧運；同年 9 月，習近平自新冠疫情以來首次出訪也選擇前往中亞。在此次首屆正式峰會，中國更提出與中亞合作之 8 點建議，包括加強全方位對話之機制建設、進一步拓展經貿關係、深化互聯互通（尤其是落實中吉烏鐵路項目）、擴大能源合作、推進綠色創新、協助提升發展能力（提供 260 億元人民幣融資和無償援助）、加強文明對話、維護地區和平（包括阿富汗議題多邊協商）等，同時涵蓋延續性與新增項目。

大體來說，近期北京對中亞之政策思考或有以下幾項：首先是利用其地緣優勢，藉由深化與中亞互動來延續落實其「一帶一路」政策；其次，或許利用烏克蘭戰爭帶來俄羅斯對其戰略依賴契機，爭取更多在中亞之主導發言權；第三是體認自身能源不足現實，著眼中亞地區對其能源安全結構之重要性；最後，回應前述各國紛紛聚焦此地區之布局，如同美國先前透過長達 20 年阿富汗戰爭企圖插旗中亞之戰略思考，是否能掌握此一「心臟地帶」對未來美中競爭勢必難以忽視之影響。

六、中共「聯合利劍」對臺軍演分析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穎佑主稿

- 共軍未如 2022 年 8 月對臺軍演使用飛彈試射，不代表局勢緩和，將臺海問題內政化，利用海空兵力對臺圍堵及搶佔有利的戰術位置，為此次軍演最大目的。
- 中共航艦戰力有限，但在我國東部海域出現仍會影響我防禦戰略。未來除共軍海空兵力外，更需關注無人機應用，並研擬因應策略。

（一）前言

2023 年 4 月在蔡英文總統出訪於美國過境時，與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中共當時就有媒體宣稱會給臺灣相對應的回應。其後便宣布 4 月 5 至 7 日進行「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同月 8 至 10 日再宣布進行「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期間除透過軍力對我國展開武嚇之外，也利用各種媒體進行文攻。雖有不少媒體觀察中共此次軍演的兵力規模與威懾強度不如 2022 年圍臺軍演，但在軍事觀察上，可以看到共軍在用兵模式與演習的想定上與去年軍演不同之處。嚴格來說 2 次軍演的想定不同，操演的內容自然也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我國絕不能因為中共無進行飛彈試射，便誤認臺海局勢較為安全。

（二）目標不同、單位不同

首先，此次軍演可以說是中共新一屆軍委會的初試啼聲，期間可以看到共軍在指揮體系上的磨合已逐漸成熟。但與去年軍演相比，在外交上卻未如去年對裴洛西訪臺一樣採取極高層級的抗議。如在軍演的新聞上是由東部戰區發布，並未如去年由新華社發布，這便代表在層級上的不同。自然去年的軍演除在抗議美國眾議院議長訪臺之外，也同時在為去年 10 月的「二十大」會議做準備。但今年蔡英文總統訪美的行程中，並無太多突破中共紅線的作為，自然在外交宣傳上不需要類似去年的舉動。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軍演中，共軍火箭軍雖有參與，但只有部分操演，並未進行實彈發射。其最可能的原因，應在北京希望能降低此次軍演對國際上的衝擊，畢竟去年軍演中東風飛彈落入日本經濟海域所帶來的後續外交影響，讓日本在軍事上與美國有更多合作，甚至也出現日本海上自衛隊船艦、我國海軍、中共海軍艦船同時在一起互相監控的景象。固然日本的軍事外交上有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態度，但日本在近 2 年的作為，都可看到圍堵中共的影子，讓國際出現「臺海有事不是只有日本有事，而是全球都有事」的論調，這都是中共極力避免的狀況。畢竟在北京的戰略中，自然會希望將臺海軍事衝突淡化成為單純的兩岸問題，讓臺灣問題「內政化」，這個絕對是北京大戰略的方向。因此如何利用海空兵力對我國進行圍堵以及搶佔有利的戰術位置，便可能是此次軍演中共最大的目的。

（三）此次軍演的兵力運用

中共也深知在戰時要突穿美國在第一島鏈的部署絕非易事，特別是美國在琉球與日本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配合近期與菲律賓合作的新型中小基地，都可以對共軍產生封鎖作用。因此對共軍而言，或許需要在平時就將船艦部署在我國東部海域，並透過單一艦隻的陸續突穿，最後在中央軍委命令下達之時，將散在海面上的軍艦集結成為攻擊艦隊，並進駐戰術位置。這中間考驗就便是戰區聯合作戰指揮的能力，特別是在艦隻的運用上，不一定都來自同一艦隊，甚至在此次軍演中，也有看到隸屬交通運輸部的海巡 06 船艦參與行動，凸顯中共在跨部門聯合行動上的整合能力，未來在臺海可能會碰到的威脅不會是只有來自於共軍，任何的公務單位都有可能從海空對我國造成威脅，如海警局的慢速巡邏機便曾在外島出現過。

（四）共軍的航艦戰略與應用

在此次軍演中，也可以看到共軍航空母艦出現在我花東外海，並且實際有戰機起降，這也代表我國花東區域已非過去所想定的安全區域，花蓮佳山基地與志航基地都可能在戰時成為共軍打擊的目標，這

也是當前我國國軍會在東部機場有新戰略調整的原因。需注意的是中共的航艦編隊不會是單艘出擊，必定會有其他護航兵力，甚至在水下也應會有潛艦的行蹤。東岸的共軍固然會對我東部造成一定威脅，但我軍若是能與可能從西太平洋前來馳援的外軍進行情報分享與系統交接，是否可能對出現在我國東岸的共軍進行包圍，或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而在外界關注的山東艦上，其依然只能搭載 20 至 40 架艦載機；因此，在進行對海面或是陸基進行打擊時，是否擁有足夠的艦載機進行艦隊防空便是疑問。因此，在共軍的航艦使用上是否會需要另一艘航空母艦搭配進行空中掩護，是未來可以觀察的方向。畢竟美國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大多都有 70 架戰機以上的實力，同時在起降架次效率上，也是美軍略勝一籌，這都是未來中共航空母艦需突破的問題。當然對共軍而言，其海軍戰略上是否會以航空母艦作為打擊的主力值得商榷，畢竟航艦的戰力取決於艦載機的性能，中共海軍是否有可能會以 055 大型驅逐艦為主力，航艦只是扮演空中掩護的角色，要走美國的航艦作戰模式，或是前蘇聯的海軍戰略，這個戰略十字路口或許共軍也在摸索中，未來發展還需要時間觀察。

（五）結語

此次軍演雖在 4 月 10 號已落幕，但不代表共軍對我國的襲擾便已結束。共軍持續利用海空兵力襲擾我國 ADIZ 之外，更運用有雙尾蠟之稱的 TB-001 以及 BZK-005 無人機飛至我國東部空域。展現空中圍臺以及對我國東部的觀測，特別是未來對我國東部進行飛彈攻擊的戰果觀測，相對於出現在我國東部的共艦，無人機應是在戰時較易飛至我國東岸的載具。此外其是否也可能在與出現在東部海域的中共艦隻進行聯合演訓，或是進行導航與定位的演練，都是未來可以注意的方向。我方除監控之外，是否可以運用電子戰的方式對其進行干擾，甚至如伊朗當年對美國無人機 RQ170 進行空中誘捕，或許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